

刘少奇的身后事



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迎接刘少奇的骨灰

1968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,根据林彪、江青一伙编造的假证据,作出了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,并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。1969 年 10 月,林彪发出“一号命令”,全军进入一级战备,准备打仗。“四人帮”趁此又对重病中的刘少奇进行迫害。1969 年 10 月 17 日晚,刘少奇被抬上飞机,从北京秘密押解到河南省开封市北土街 10 号交给当地驻军监护。此时,刘少奇身边无一亲人,重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,于 1969 年 11 月 12 日晨含冤逝世。刘少奇逝世后,他的专案组从北京赶到开封,向驻军交代要保密,把刘少奇化名“刘卫黄”,以平民无业的身份,在开封火化场火化、存放,骨灰盒是用最低等级的

三合板做的,编号 123。驻军拍下刘少奇逝世时的现场,好不容易留下一张刘少奇逝世时安卧在病床上的一幅照片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中共中央抓紧平反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冤假错案。经调查证明,林彪、江青一伙炮制的《关于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》是用伪证写成的,是全党最大的冤案。1980 年 2 月,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《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》。中央向全党发出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,成立治丧委员会。由中央组织部牵头组成治丧办公室。

1980 年 5 月 13 日,党中央派中共中央委员、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、王首道陪同王光美同志及子女,乘专机去河南省郑州市迎取刘少奇的骨灰。河南省委书记、省长刘杰敬重地将刘少奇的骨灰盒转交给王光美。会后有几万名郑州市民、工人、农民、干部、学生以及解放军的指战员聚集在人民会堂、金水大道通往郑州机场的道路两旁,向刘少奇的灵车鞠躬哀悼,眼含热泪目送灵车远去。

5 月 15 日,刘少奇同志治丧委员会发出公告:为深切悼念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,定于 1980 年 5 月 17 日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。同日,首都天安门、新华门、外交部、中央和国家机关、我国驻外使馆和其他驻外机构,北京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机关、部队、企业事业、学校等单位下半旗志哀,停止娱乐活动一天。

5 月 17 日,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。在万人大礼堂举行追悼会,这是人民大会堂 1959 年建成后的第一次,万人规模也是第一次。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代表 1 万多人出席追悼大会。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,悼词中说:“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,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。和毛泽东同志、周恩来同志、朱德同志一样,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。”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、陈云、宋庆龄到王光美同志及子女面前握手哀悼并慰问,邓小平对王光美说:“是喜事,是胜利”

早在 1956 年 4 月,刘少奇郑重地嘱咐王光美:“我去世后遗体火化,不保留骨灰。把骨灰撒在大海里,像恩格斯一样。”根据他生前的遗愿,经党中央批准,198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8 时,在西郊机场举行了简短的送骨灰仪式,专机 8 时 30 分飞向山东省青岛市。

10 时整专机在青岛机场落地。500 多名海军官兵早已在码头列队哀悼和迎接刘少奇骨灰登舰。王光美一行登上 101 驱逐舰,大约在 12 时 101 舰到达预定撒骨灰的海域,即我国领海线 12 海里以外的公海上。经请示王光美同意,放哀乐,全体登舰人员肃立默哀,开始撒骨灰。此时王光美万分悲痛,泣不成声,手捧掺着花瓣的骨灰撒向大海,子女们也照此你一把、我一把悲痛地把亲人的骨灰撒向大海,现场极其悲痛。约在 12 时 30 分撒骨灰结束。摘自《百年潮》傅学正/文

陈寅恪: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

从上世纪 20 年代开始,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,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。甚至他的名字,也被人们一再讨论——当年,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(qù)先生。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“恪(qù)”这样的读音,有人请教他:“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(qùè),你却不予纠正呢?”陈先生笑着反问道:“有这个必要吗?”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,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。他在国难、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,为学问付出一生。

被称为“活字典”“教授的教授” 1925 年,清华发生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:成立“清华国学研究院”。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

学的方法整理国故,培养“以著述为毕生事业”的国学人才。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,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,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。

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: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;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、著述等身的梁启超;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。三位导师性格各异,但都大名鼎鼎。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,在当时并不出名。

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。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,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。他上课时,

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。有人称他为“活字典”,也有人称他是“教授的教授”。

学术传承 泽被后世 新中国成立后,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,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、中国文史馆副馆长、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,任中山大学教授。

“文革”期间,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。1969 年 10 月 7 日,陈寅恪走完他 79 岁的生命历程。

陈寅恪没有遗嘱,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。他留下的著作,以繁体字竖排出版,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。这些文字,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,“留赠来者”。(本报综合)

杨水才:小车不倒只管推



1969 年 7 月 13 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题为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——记共产党员杨水才同志的光辉事迹”的文章。同月 31 日《人民日报》又以“为人民鞠躬尽瘁”为题,发表评论员文章,高度赞扬杨水才同志。当年全国掀起学习杨水才的热潮,水道杨村建起了“杨水才展览馆”,参观

学习者络绎不绝。杨水才的“小车不倒只管推”,更是成了广为流传的名言。

杨水才(1924—1966 年),许昌县桂村乡水道杨村人。自幼家贫,12 岁给地主扛长工。1949 年 3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,在解放江南的战斗中立大功一次,小功两次,并获“人民功臣”称号。

1951 年复员还乡后,为解决生产困难,杨水才组织 10 户农民,建立水道杨第一个互助组,并把自己的 40 万元(旧制人民币)复员费交给组里购买肥料,发展生产。1956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,不久当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。为改变水道杨村的穷困面貌,1963 年 9 月他组织的农中开学,开始时在破剧院、树阴下上课,为农村培养大批建设人才,群众称赞农中是“农民的学校”。

杨水才生活简朴,办事勤俭。到地、

县开会,大都是步行。他的棉衣翻拆好几次,一顶帽子戴八、九年,人们劝他换新的,“焦裕禄是县委书记,衣服都是穿了补,补了穿,咱咋就不能哩。”

杨水才身患肾结石、胃溃疡、肺结核等多种疾病,曾因在酷暑下嫁接树木而昏倒在苗圃里,但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。疾病的折磨,工作的劳累,使他身体渐渐消瘦,摔倒的次数也越来越多。同志们劝他休息,他说“小车不倒只管推”。1966 年 12 月 4 日,杨水才开会、劳动、调查、座谈……,忙了整整 18 个小时,由于劳累过度,第二天病逝于苗圃的一间小屋里。(本报综合)

《毛泽东选集》发行 1.5 亿部

1966 年至 1969 年,我国共出版发行包括汉、蒙古、藏、维吾尔、哈萨克、朝鲜等各种文版的《毛泽东选集》1.5 亿多部,相当于文革前 15 年出版总和的 13 倍多。

同一个时期内,全国还出版发行《毛泽东著作选读》1.4 亿多

册、《毛主席语录》7.4 亿多册、毛主席的“老三篇”、“老五篇”和《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》等著作的汇编本、单编本近 20 亿册、《毛主席诗词》9600 多万册。

(本报综合)

相关链接

“老三篇”与“老五篇”

“老三篇”指毛泽东的三篇短文,分别为《为人民服务》(1944 年 9 月 8 日)、《纪念白求恩》(1939 年 12 月 21 日)、《愚公移山》(1945 年 6 月 11 日)。“老三篇”主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“为人民服务”、“毫不利己,专门利人”、“艰苦奋斗”的理念。

“老三篇”的说法最早由林彪提出,后来在“老三篇”的基础上又加了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》和《反对自由主义》两篇文章,统称“老五篇”。

“文革”期间,几乎人人都会背诵“老三篇”和“老五篇”。



1965 年 1 月 15 日,有关部门正式向中央呈报了《修建北京地下铁道的报告》。不久,铁道兵、铁道部地铁工程局、北京城建局共 4 万多建设者聚集北京,投入修建地铁的大工程。1969 年 9 月 20 日地铁一期工程建成通车。图为北京地铁一期工程正式通车时的盛况。



1969 年 9 月 23 日,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建成。工程位于京杭大运河、新通扬运河和淮河入江尾闾芒稻河的交汇处。工程全部由中国自行设计,全套设备自行制造和安装,于 1961 年开工兴建。

1969 年 7 月 8 日,河南省林县(今林州市)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。这条渠 1960 年动工兴建,总干渠长 50.2 公里。1996 年 9 月,红旗渠被国家教委、民政部、文化部、国家文物局、共青团中央、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命名为“全国中小学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之一。图为林县红旗渠工程通水后的情景。

贺龙元帅被迫害致死

1969 年 6 月 9 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,被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,终年 73 岁。

贺龙是湖南桑植人。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,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、第二十军军长等职。1927 年参加领导“八一”南昌起义,任起义总指挥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历任红军第二军、第二

军团总指挥。1934 年在贵州与任弼时军团会合,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。历任红二、红六军团总指挥等职。1935 年参加长征,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,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,并任司令员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西北军区司令员、西北局第二书记。建国后,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、西南军区司令员、西南局第三书记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,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、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